

威廉·琼斯的音标研究及其影响^{*}

陈满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提要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创者威廉·琼斯为了解决用罗马字母转写亚洲一些语言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深入研究了亚洲几种重要语言的书写系统,撰写了《论亚洲词汇的罗马字母正写法》,分析了当时的一些转写方法的优缺点,提出了用罗马字母转写的原则,制定了持续影响达 1 个多世纪的“琼斯系统”(Jonesian System),奠定了“琼斯音标”的基础。琼斯音标是国际音标出现以前记写亚洲语言发音、转写亚洲拼音文字的影响最大的音标兼书写体系,对我国的方言罗马字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威廉·琼斯 正写法 音标 琼斯系统 方言罗马字

中图分类号 H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9484(2010)01 - 0091 - 08

1 引言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创者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不但最早提出印欧语假说,而且还有大量的其他有关语言问题的研究。(陈满华 2007, 2008a, 2008b)在印度期间(1783 - 1794),他在翻译东方国家的经典著作时遇到用罗马字母转写亚洲语言方面的困难。当时西方列强加紧对外扩张、殖民,同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些重要的东方经典正在由传教士和一些学者移译为西方文字,琼斯本人在印度期间也有翻译东方著作的宏大计划(包括翻译我国的《诗经》、《论语》)。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比较统一的罗马字母转写标准,于是出现了不同西方人士书写亚洲某一语言的同一个音用上了不同字母、符号的情况,结果造成了混乱,尤其是专名转写的问题更严重:同一个亚洲人(或地方)在不同学者的著作里成了不同的人(或地方),反之亦然。当时并没有一个像现在的国际语音协会这样的组织可以聚集众多学者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一局面,在欧洲学术界已声名赫赫的琼斯认为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了。于是,对东方主要语言梵语、孟加拉语、印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深有研究、也粗通藏语、汉语等语言的琼斯靠个人的力量深入研究了儿种主要亚洲语言的文字,撰写了长篇论文《论亚洲词汇的罗马字母正写法》(A Dissertation on the Orthography of Asiatick Words in Roman Letters)(以下简称《正写法》),这篇专论写于 1786 年,最初发表在亚洲学会的会刊《亚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创刊号(1788 年第 1 期),后来收入 1807 年编定的《威廉·琼斯爵士著作集》第三卷。(Jones 1807:253 - 318)

这篇论文产生了音标研究领域里持续影响达 1 个多世纪的“琼斯体系”(Jonesian System),奠定了

[收稿日期] 2008 年 11 月 15 日 [定稿日期] 2009 年 10 月 18 日

^{*} 本文的修改稿采用了《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后来的各种有所改进的“琼斯音标”(Jonesian Letters)的基础,对许多东方语言的罗马字转写规范、对方言调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我国的方言罗马字的制定也产生了影响。本文主要介绍琼斯这部著作的要点及其多方面的影响。

2 琼斯《正写法》的内容梗概

在琼斯的时代,人们还没有严格区分字母和音标,更确切地说,当时的学者所说的字母(letter)指文字,也可以指实际发音的符号,即现代意义上的音标。琼斯的《正写法》一文虽然立足点是字母书写符号,属于文字学范畴,但是所讨论的字母都涉及了实际发音,所采用的字母兼有音标的功能。换句话说,这篇文章既是研究字母的,又是研究音标的,其中许多内容属于语音学的范畴。下面介绍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

2.1 交代研究缘起、确立转写原则

文章的开头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有机会做亚洲文献摘录或要翻译亚洲语言的人,一定总会发现:如果用一般在欧洲人中通用的文字来表达阿拉伯、印度和波斯的词语或句子,那将是方便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作者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使用符号的方法(a method of notation),但是还没有一家在形式上显示了完整的系统。”(Jones 1807:253)因此,有必要设计出一套更“完整”、合理的转写方案。

他接着说“每一个原来的音(指转写前的亚洲语言的语音——引者)都可以保持不变地用一个合适的符号表示,遵循自然的发音顺序(order of articulation),并照顾到罗马字母的原有功能,这种罗马字母现代欧洲已经普遍采用。”(Jones 1807:253)这句话可以看成琼斯的转写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表述为:要有统一性、连贯性,要一对一,不可“兼职”;要符合音理,又要考虑能与罗马字母对应上。他说,遗憾的是,欧洲人转写的亚洲名称等违背了这些原则。例如,古代希腊人的一些转写,“造成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很大的迷惑。”他说,“古代希腊人,他们自愿地牺牲真实性而迁就听觉的舒适性,好象已经有意(by design)地改变了所有的东方名字,他们把这些名字引入到了他们的优美却又浪漫的历史学中……他们有一个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习惯:强行使外国名字适应希腊语形式,让这些名字相似于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派生词语,因此,他们把 Gogra 改为 Agoranis,即 a river of the assembly(交汇河),把 Uchah 改成 Oxydrancoe,即 sharpfought(激战的),把 Renas 改成 Aornos,即 a rock inaccessible to birds(无鸟岩)……”。(Jones 1807:253 - 254)

接着琼斯简单评介了当时流行的两种罗马字母转写的办法。“第一种方法声称主要注意将要表示的词语的发音”(Jones 1807:258),就是说,在转写时,企图把东方语言里的各种实际发音都反映出来,而不太注意该语言原来的字母或记音符号的情况;如果原字母与实际发音相脱节,那么转写时并不按照原字母寻找对应的西方语言的字母,而是根据东方语言的实际发音寻找西方语言里对应的字母或符号。“第二种系统的做法是非常仔细地以字母译出字母,而不特别关注保留发音。”(Jones 1807:259 - 260)就是说,这种体系只关注原字母在西方语言里的对应字母的情况,而不关心东方语言里原来的字母代表的是什么音,哪怕这个字母与实际发音相差很大,也不按实际的发音使用对应的罗马字母来转写。琼斯指出两种模式都还存在问题。关于第一种模式,他举了一位叫 Major Davy 的先生用这种方法书写波斯语的例子。他说,“例如,阿塞拜疆的首府现叫做‘Tabriz’^[1],我从出生于该城市的人的口里知道了

[1] 大不里士,在现在的伊朗西北部,仍是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省的首府。此处的阿塞拜疆不是现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

这点,我也从其他伊朗人那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从托勒密地理学(the Geograghy of Ptolemy)中都知道 1600 年前就这么叫了;可是,Major Davy 总是把它写成 Tubburaze,并且坚持要如此发音。”(Jones 1807:260 - 261) 结果是,认识罗马字母的波斯本地人根本不知道是指自己的首府。

关于第二种模式,他说,这种方法有两个支持者:Halhed 先生和 Wilkins。他认为这种方式虽然有一面,但是也同样存在问题。他说:“如果说有什么令我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在他(指 Halhed——引者)的清晰和确切的体系中使用了双字母表示一个长元音(这或许是合理的)以及频繁地在同一个词语里混杂着古意大利字母和罗马字母(intermixture of Italick with Roman letters)这两点在书写和印刷方面必然都是很很不方便的……”。(Jones 1807:262)

不过,琼斯赞同 Halhed 对一般语言的拼写法和英语字母的评价。他说,Halhed 公正地指出“任何语言的拼写法的两大缺陷是几个音使用同一个字母以及同一个音有不同的字母”,Halhed 已经指明这两个现象“在英语中如此普遍,以至他在选择字母来表达孟加拉语的元音的声音时,感到非常为难,结果是他根本就不满意自己的选择。”琼斯认为 Halhed 的评价是正确的。(Jones 1807:261 - 262)

琼斯还进一步指出现行英语教学中所说的英语有“五个元音”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确切的。^[2]他认为,“尽管古代寻求真理者很沮丧地说‘万物皆充满错误’,但是我们刚起步学习时就整个地忽视(问题),那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准确的情况;在英国,我们从读‘五个元音’开始,而其中的两个元音清清楚楚是二合元音,我们就是被教着这样发音的。这着实令人惋惜。”(Jones 1807:264)

2.2 对发音原理的阐述

在评介了当时流行的转写方法后,琼斯没有急于提出自己的方案,而是先阐述发音的原理。他介绍、描写了一些不同的语音发音情况,如英语的五个元音、主要的辅音,如齿音、唇音等的发音原理。这一部分内容跟现代的语音学的阐述已经非常接近。他认识到了(送气)气流在发音上的重要作用,他说:“发音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轻吐气和重吐气(soft and hard breathings)”(Jones 1807:264);在语言中,元音有长短之别,即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相对应而存在。例如,字母 a、e、i、o、u 既代表短音,也表示长音,英语里的“an innocent bull”里出现了全部五个元音,都是短音,而一个意大利人念这些短语时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母语里的习惯念成单音节 sa、fi、so、se、su 里的 a、e、i、o、u,这时候它们是长元音。这样,字母 a、e、i、o、u 实际上代表了 10 个元音。(Jones 1807:264 - 265)接着,琼斯进而说明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细微的过渡音的情况:在这 10 个元音之间有大量的过渡音(graduations)以及精细的曲折变化形式(inflexions),它们只能用于教学。^[3]所有的过渡音都进行组合,就可以形成上百的二合元音和上千的三合元音(triphthongs),这些音有不少可见于意大利语中,在希腊语里也可能有这样发音的。但是,在本节中,我们只有机会讨论二合元音:它们由第一个元音和第三个元音、第五个元音组成(即组成 ai 和 au——引者)。这些组合应该用这些元音的字母本身来表示。至于那些开头是第三个和第五个短元音(指 i 和 u——引者)构成的元音组合(vocal compounds),人们一般用不同的字母表示了,这并非不方便;这两个音被不恰当地归入了辅音。(Jones 1807:265 - 267)

可以看出,琼斯审音时非常仔细,他对不同元音之间的过渡音的特点的描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称道的。这段话里的“第三个和第五个短元音构成的元音组合”实际上指的是像英语里的[j]、[w]这样的半元音与其他元音的组合。他批评当时的人把这样的音归入辅音,而他自己把这些音归入了半元音。

[2] “五个元音”指 a、e、i、o、u。

[3] 琼斯的意思是这些极其细微的过渡音不能在原理上一个一个地描述并用相应的字符(音标)记录,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不过,在教学中可以进行说明,可以示范出这些音的过渡情况。

紧接着,琼斯又说明了舌这一部位在发音中的重要作用,描述了两个流音(liquid sounds)的发音方法,并指出他们也有元音性质。(Jones 1807:266)

在描述了元音的性质和不同类型之后,琼斯分别描写了主要的辅音,如齿音、唇音等,他对这些音的发音方法的阐述也很详细。

在此基础上,作者决定对英语所采用的书写系统进行补充,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亚洲字母转写问题的处理方案:我们英语里的字母和书写法并不完美,有失体面、荒谬可笑,^[4]我们学会的罗马字母的发音是不合理的,如果那样去发音的话,就不可能以罗马字母表达印度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但是一个新文字的混合体系又不方便,那么借助法语里使用的附加符号,加上我们在关于微分(fluxions)的论文里所采用的一些符号,我们就可以很爽快地应用现在的字母来记写所有的亚洲语言,它在精确和清晰方面可以与天城体文字媲美,它很有规则,任何认识原字母的人,都可以很快地、不费劲地把所有的专名、普通名词(Appellatives)和所引述的段落转写过来。(Jones 1807:269—270)

就是说,虽然不可能直接搬用英语的书写系统,可是又不便另起炉灶,搞一套全新的,于是便采用稍有改动、运用附加符号的办法。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到,琼斯对自己的体系是充满自信的。

接下来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讨论具体的天城体文字字母的罗马字母转写问题,一共讨论了 50 个字母。据笔者所知,这些字母是孟加拉语的文字(天城体文字之一种),只有个别的在写法上不同于现代孟加拉语字母表。每一个都有音理分析。比如,指出该字母的发音特点,相当于或接近欧洲语言的哪个音(或哪个字母)。在分析发音特点时,不但说明该字母在孟加拉语的发音情况,有时还提到在印度其他语言、方言里的发音情况,也常常说明相当于或接近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藏语里的哪个音。琼斯也常常提到这个字母对等于梵语天城体文字中的哪个字母。下面试举几个字母的例子。

1)对元音 ঐ(孟加拉语字母,现在一般记为 ā)的描述为:

当波斯语的 bakht 所发的那个第一元音在 bākht 里延长的时候,它就是见于天城体文字字母的第二元音、阿拉伯语字母的第一元音,就是我们的 cast 里的元音;不过,阿拉伯人嘲笑波斯人这个字母的开放发音(broad pronunciation),这个音在伊朗总是我们的 call 里的元音,常常拖(prolated)得很长,以至于相似于我们的长元音里的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即 o、u 的长音,琼斯指的是[ou]和[u:]——引者)。它的自然的标记为重复的短 A;但是在词语中间的重读和在词尾的轻读,都一样清晰,就像欧洲大陆发音简练的国家的那种情况。阿拉伯字母里的那个开音(broad sound),阿拉伯人称为延展音(extended),波斯人延展得更加厉害,例如在 ásān 这个词中就是这样,它完全可以很巧妙地由韵律符号表示;而这个喉塞音(hamzah)符号总是缩短了这个字母(指书写上缩小了位置——引者),使它的发音位置高了一点或低了一点,正如在词语 ósul 和 Islām 中地那样。……(Jones 1807:271—272)

2)对辅音 ঙ(孟加拉语字母,现在一般记为 d)的描述是:“软齿音(soft dental,或译不送气齿音),如 Dévatā 或 Deity(里的 D)。”(Jones 1807:287)

3)对辅音 ণ(孟加拉语字母,现在一般记为 d)的描述是:“纯鼻音(simple nasal),由齿和一些来自鼻内(的气流)辅助发出,但是鼻音不如法语和波斯语的那么重。”(Jones 1807:287)

就是说,孟加拉语字母“ঐ”相当于英语里的[ɑ:]。但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相对应的音显得更长,有时竟然会使音质都发生变化。“ঐ”就是不送气浊音[d],“ণ”是鼻音[n]。(Dakshi 1995:2—6)

[4] 琼斯的这句批评自己母语的字母和拼写法的话说得很严重,原文是“*Our English alphabet and orthography are disgracefully and ridiculously imperfect*”。

2.3 琼斯音标系统

琼斯在以上介绍的分析、考察的基础上,为亚洲几种主要语言的罗马字转写制定了一套字母。这套字母集中体现在论文附表《印度语言、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字母表》(the System of Indian, Arabian & Persian Letters)中。(Jones 1807:252)这张表里的“字母”是用来转写印度等东方语言的罗马字母。根据这张表,我们将他确认的各类字母(音)排列如下:

元音、二合元音、半元音:

a e i o u ā â ã á à ê è î ī ï ĭ ó û ù

ai au

y w r l

辅音:

c c'h k s t p kh sh t'h t'h th p'h f

g z d b gh zh d'h dh b'h v ṅ ś ṇ n m

复合音:

ch ch, h j jh ṅy z z z csh jṅy

这就是最早的威廉·琼斯音标系统。其中,元音上方带“˘”(circumflex)的表示鼻化元音。上方带的“˘˘˘˘˘”等符号表示该音是一个与不带这个符号的那个音发音方法相同、发音部位邻近的某个音,如,ó 相当于[ɔ]。“h”表示送气,“'h”表示很强的送气。这种强送气音在行文中可以用两个连写的 h 表示,如阿拉伯语的 Muhhammed(穆罕默德)。(Jones 1807:292)

琼斯音标遵循了一个原则:鉴于当时加尔各答的印刷条件,不增加新字母(音标),而是大量采用添加符号(diacritic)解决罗马字母不够用的问题,这一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这张字母表可以看出,琼斯对语音的描写已经比较精细。例如,在元音中,区分了单元音和二合元音、一般元音和半元音。在辅音中,也有很细致的分类,有的充分考虑了东方几种重要语言的特点,如在送气音里,他分出了轻吐气和重吐气,相当于轻送气和重送气。这些术语及其所表达的概念基本上被后世所承袭。这表明琼斯在当时无疑站在语音研究的前沿阵地。

琼斯在本文中还选取了印度语言、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的文章(诗歌)片段,用他的这套系统进行转写,以作为样品。

3 琼斯音标与我国方言罗马字

威廉·琼斯的《正写法》发表后,琼斯音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音标系统对我国的方言记音也产生了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海禁开放,英美的各派教会陆续向我国派遣传教士,其中大都在东南沿海传教。为了将《圣经》思想完美地用当地的语言传达出来,从而把基督教的福音最有效地传至民间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传教士认真地学习、记录和研究中国沿海地区各大城市的方言,于是,为中国各地的土语设计了大量的罗马文字。(参见许长安、李乐毅 1992:1)根据学者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在这些罗马字中,至少有福州话罗马字是以琼斯音标系统为基础设计的。

福州话罗马字也称为“平话字”。陈泽平(2002)介绍了福州话罗马字。他考察了多种 19 世纪西方人记录福州话的著作,其中早期的有:《福州的中国话》(The Chineses Language Spoken at Fu Chau),1856 年 7 月发表在基督教《卫理公会季度评论》(Methodist Quaterly Review For July,1856),作者是美国神甫 M. C. White);《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

1870 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 编者是来自美国宾州的传教士 R. S. Maclay 和另一个美国神甫 C. C. Baldwin。陈泽平(2002)认为:“这一系列文献的作者都是当时在福州工作的英美传教士或外交官, 怀特的著作为其滥觞。他最初采用威廉·琼斯的音标系统记录了 19 世纪中叶的福州方言音系, 后继者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略加调整, 逐步丰富了对音系的描写说明。”White 引入的“威廉·琼斯音标”指的就是我们在上文中介绍的琼斯音标系统(个别的经过了后人的改动)。琼斯的那套系统本来就是为了转写亚洲文字的, 传教士用来记录我国的方言, 也算是正常的情况。White 做这件事情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 琼斯的音标被用来记录福建话至少也是离琼斯在世的时代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从这件事上, 我们也可以一窥琼斯音标系统的影响之一斑。当然, 陈先生没有具体介绍 White 根据琼斯音标所创制的福州话罗马字, 因此, 我们无法比较 White 的系统和琼斯原来的系统。Baldwin 的系统是 White 的系统改进以后的产物, 我们通过比较发现, Baldwin 用来记录福州话的音标系统与琼斯的系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 琼斯的基础还在, 琼斯的方法得到了继承, 如某些二合元音不用两个不同的音标, 而是在一个音标上加符号。

White、Baldwin 等人的改进是必要的。当初琼斯设计他的音标系统时, 虽然声称是为书写“亚洲词汇”用的, 但是他毕竟主要是考虑印度语言、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的, 而汉语是声调语言, 有自己的一些特有的方面需要有特殊的办法, 所以, White 对琼斯音标当有所调整, 而以后的传教士对琼斯方案记录的福州罗马字更是需要改进。

到了 20 世纪, 特别是民国以后, 随着注音字母和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大力推行, 以琼斯系统为基础的福州平话字的影响逐渐减少。

4 琼斯音标的影响

琼斯的《正写法》是国际音标(IPA)诞生以前的一篇重要的研究音标问题的论文, 他设计的适合多种东方语言的罗马字母转写系统被称为琼斯系统(Jonesian System)。(Cannon 1990:249 - 250)这个系统虽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 但在当时是很令人耳目一新的, 很快就被亚洲学会和其他的机构和个人所采用, 这是在通往国际音标的路途上的一块里程碑。(参见 Cannon 1993:vol. 1 xxxix; Kemp, A. 2006:400)其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 琼斯音标在后来的东、西方语言转写、翻译以及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琼斯的论文发表以后, 印度的亚洲学会的论文统一采用了琼斯音标, 其他国家的一些东方学会或亚洲学会也采用了这个体系(或有修补)。另外, 据印度学者 Miranda (2006:614), 很早以前(约早于琼斯 200 年)在印度果阿(Goa)的耶稣会士创制了一套为描写康加尼语(Kankani)使用的罗马字母转写系统, 但是, 这套系统不能适应其他众多的东方语言。琼斯系统面世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Miranda (2006:614)认为, “琼斯创制系统的罗马字母转写方法, 可以用来记写梵语和现代印度语言。除了有当地语言的文字之外, 许多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印度语言的字典都采用了建立在琼斯的转写法基础之上的罗马字母转写法。”Kemp (2006:400)称琼斯为“很有经验的语音学家”, “他的音标几乎影响了后来的、至少是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的所有转写东方语言的想法。”可见, 琼斯的音标系统的确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琼斯体系影响之大超出了语言研究、文学翻译的范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th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在琼斯去世 40 多年后(1836 年)采用了琼斯音标记录世界地名, 这恐怕连琼斯本人也没有预料到。(Cannon 1990:379)

其次, 琼斯音标推进了语音和音标的研究。琼斯的论文第一次正式把东方语言的发音与罗马字母不对等的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激发了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兴趣。岑麒祥(1988:322)说, 琼斯

1786 年的第三周年演讲“不独引起了人们对于印欧系语言的比较研究,而且激发了怎样把像梵语、波斯语等这样的不是用拉丁语字母拼写的语言转写的问题。接着他还写了一篇《关于亚洲语词用罗马字母正写论》的文章,^[5]极力赞扬印度梵语天城体音节文字的合理,反而附带指责英语正词法的混乱,认为在教学上说‘英语只有五个元音,那是毫无道理的’。”威廉·琼斯的这一番议论,当时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埃利斯(A. S. Ellis)和皮特曼爵士(Sir Isaac Pitman)合作发起研究字母改革的问题。到 1885 年,勒普修斯(C. R. Lepsius)根据言语发音的生理学原理拟出了一种《标准字母》,连电话发明人格拉汉·贝尔(A. Craham Bell)的儿子美尔维尔(Melville Bell)也根据他的实验拟出了一种以发音器官动作为基础的‘可见的话’(又译‘视识话’)。”(岑麒祥 1988:322 - 323)这些由琼斯引发的对拼写法、通用字母的探索,虽然其具体成果没有全面应用,但对当时的语音学研究却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次,琼斯音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音标的制定。琼斯体系重视实际发音的原则使得后来的语音学家深刻认识到现成的欧洲语言字母与语言里的实际发音相脱节的问题,从而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在现成的(作为文字的)字母以外制定纯粹记录发音的国际通行的音标。琼斯不随大流把[j]、[w]等归入辅音,而是力主把这些音归入半元音,在 200 多年前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的语音学大师、国际音标的创始人之一的 Henry Sweet 对语音的细微观察可能受到了他的这些思想和观察方法的影响,至少事实是国际音标对有关音的处理与琼斯的这一思想是吻合的。此外,琼斯音标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影响到了国际音标体系。例如琼斯系统采取添加符号解决罗马字母不够用的问题,这一办法后来在国际音标的制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就是说,琼斯的这一贡献对国际音标的制定产生了影响。(Cannon 1990:249)威廉·琼斯堪称音标研究的先驱。

当然,琼斯的音标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罗马字拼音符号系统用于其他语言,有两种情况:一是按西方的字母对应原字母(即转写),二是用西方的字母符号对应原语音(即拼写)。虽然琼斯自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论文的重点并没有离开拼音文字系统之间的“转写”。他的论述没有涉及到没有文字的语言或不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汉语)的罗马字正字法问题。事实上,就没有文字或非拼音文字的语言而言,并不存在字母符号对字母符号的“转写”问题,而只有字母符号对应语音的记音或“拼写”问题。琼斯的论文虽然声称是针对亚洲主要语言的,而实际上只讨论了转写问题,忽略了汉语这样的“主要亚洲语言”。正因为如此,传教士后来改进汉语方言罗马字时,首先还要解决每一个方言音的性质问题,即确定是个什么音,然后才能运用琼斯音标或其他音标系统。其次,他拟出的部分“复合音”违反了一个音一个符号的原则,至少在符号的选择上不够理想,有的音竟然用了三个字母合起来表示。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借用罗马字母以外的字母或新创符号来彻底解决,琼斯未能大胆地这样做,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缺陷。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在字母和音标的区别尚处在朦胧状态的时代,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文献

- 岑麒祥 1988 《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满华 2007 威廉·琼斯的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第 1 期,123 - 127 页。
 陈满华 2008a 威廉·琼斯学汉语的经历及其对中国经典的解读,《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134 - 142 页。
 陈满华 2008b 威廉·琼斯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第 4 期,340 - 346 页。

[5] 这里的《关于亚洲语词用罗马字母正写论》即 A Dissertation on the Orthography of Asiatick Words in Roman Letters 一文。

陈泽平 2002 十九世纪的福州音系,《中国语文》第 5 期,431 - 440 页。

许长安 李乐毅 1992 《闽南白话字》,北京:语文出版社。

Cannon, G. 1990 *The Life and Mind of Oriental Jones: Sir William Jones,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nnon, G. 1993 Introduction. In Jones, S. W.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xiii - lx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Dakshi, A. 1995 *Learning Bengali*. Calcutta: Subarnarekha (Shri K. C. Datta).

Jones, S. W. 1807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vols. -). Teignmouth Lord John Shore ed., London: John Stockdale.

Kemp, A. 2006 Phonetic Transcription: History. In Keith B. et al.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vol. 5, Oxford, U K: Elsevier Ltd.

Miranda, R. 2006 Indian Lexicography. In Keith B. et al.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vol. 5, Oxford, U K: Elsevier Ltd.

作者简介

陈满华,男,1963 年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理论、语法学、语言学史研究,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方言》等语言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篇。已出版《体词谓语句研究》等三部专著。

Sir William Jones 's Alphabetic Study and Its Influence

Chen Manhu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International Colle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 To provide a universal standard in transliterating Asiatic languages in Roman letters, Sir William Jones, the founder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published his then well-known essay on the Orthography of Asiatic Words in Roman letters. After thorough study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major Asiatic writing systems, he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s in transliterating Asiatic languages, leading to the emerging of Jonesian Syste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Jones Letters, with the latter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lphabetic and writing system for Asiatic language transliterating before the birth of IPA. The Jonesian System also gave an impact on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dialectal writing systems.

Keywords Sir William Jones orthography letters Jonesian system Dialectal romanization